

黄钧儒 龚晓宽 著

东西差距 与 社会稳定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东西差距与社会稳定

作 者 黄钧儒 龚晓宽 等
责任编辑 唐流德
责任校对 金海洋
封面设计 张世申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电 话 (0851) 6828335 6828477
印 刷 贵阳圣泉彩印厂
开 本 850 × 1168mm
字 数 152 千字
印 张 7·25
版 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软精) 1000 册
书 号 ISBN7 - 221 - 04797 - 9/D·176
定 价: 12.80 元

课题组成员名单

- 组长：**黄钧儒（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龚晓宽（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 成员：**朱华清（贵州省干部智力开发中心主任）
 吴黔斌（贵州省社科规划办副主任）
 李含琳（兰州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徐 静（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副
 所长、助理研究员）
 索晓霞（《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编辑）
 肖凯林（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干部）
 田 俊（贵州省社科规划办干部）

《东西差距与社会稳定》 课题鉴定书

该课题组研究报告，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十四届五中全会决议和江泽民《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为依据，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东西差距与社会稳定”这一关系到中国前途与命运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进行了探索。我们认为，该研究报告对东西差距主要表现的论述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对东西差距逐步扩大影响稳定的研究是全面的，同时抓住了本质、抓住了重点；提出的缩小差距、保持稳定的七条战略对策具有可行性。该研究报告资料翔实，方法科学，论点明确，重点突出，论证充分，其中有些观点和建议如：“东西差距特征分析”、“东西差距对社会稳定影响的作用机制”、“解决差距问题必须的正确立足点”等部分，具有创造性，是近年来我国研究东西差距与社会稳定关系问题比较全面、深入的一个报告，具有较高学术水平与应用价值，对逐步缩小我国东西差距、保持社会稳定有现实意义，可供中央领导部门决策参考。该研究报告达到了项目申请书中有成果的设计要求，同意通过鉴定。

当然，该研究报告也有不足之处，对有些问题的分析可进一步深入。

目 录

总报告:

东西差距与社会稳定 黄钧儒 龚晓宽 (1)

分报告:

中国西北地区缩小东西部差距与

实现社会稳定对策研究 李含琳 (71)

西部经济滞后与社会失衡 徐 静 (112)

对中国东西部差距与社会不稳定

因素的初步研究 索晓霞 (131)

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

成因研究 吴黔斌 肖凯林 (144)

缩小东西差距的战略对策 朱华清 (169)

中国东西差距的差距问题

研究综述 田 俊 (204)

总报告

东西差距与社会稳定

黄钧儒 龚晓宽

地区发展差距是世界各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所遇到的共同问题。我国由于幅员辽阔，此问题的出现亦是难免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连续 20 年稳定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与此同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拉大也相当严重，其最突出点在于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应当看到，这个问题若得不到妥善解决，势必引发一系列矛盾，影响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社会稳定。为此，本研究报告围绕“差距与稳定”这一关系到中国前途与命运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进行探索。

主体报告由四大部分组成。一、严峻的事实：东西差距的主要表现；二、深层思索：东西差距的原因分析；三、矛盾演进：东西差距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四、战略措施：逐步缩小差距与保持稳定的各项对策。

第一部分 严峻的事实： 东西差距的主要表现

(一) 东、中、西部的区域界定

本报告所指的西部地区为西南、西北两大区域，即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仍按含重庆市的老口径）；东部为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 12 省份；其余为中部地区（即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 9 省区）。按照这种划分，我国西部地区 1995 年年末总人口 27670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22.84%；土地总面积 536.7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55.90%。东部地区 1995 年底，总人口 49599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40.95%；土地总面积 130.52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13.60%。中部地区 9 省（区）1995 年年末总人口 43852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36.21%；土地总面积 292.78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 30.50%。

(二) 东西差距六大标志

1. 发展速度的差距

1979 年以来，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以 10.71% 的速度递增；中部地区以 9.6% 的速度递增；而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仅为 7.2%。西部的发展速度与东部地区相差 3.51 个百分点，中部与东部的发展速度相差 1.11 个

百分点。

2. GDP 比重的差距

1978 年国内生产总值，东、中、西部地区之比为 1:0.7:0.31；到 1995 年国内生产总值东、中、西部三地区之比扩大到 1:0.49:0.24。

3.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

东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由 1978 年的 203 元，扩大到 1995 年的 3832 元，消除物价因素，平均每年拉大 10.31 个百分点。人均 GDP 的位次，1978 年与 1995 年比较，东部 83% 的地区前移，西部 55% 的地区后退。1995 年全国人均 GDP 达到 4754 元，东部平均为 6777 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42.55 个百分点；西部平均为 2945 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38.1 个百分点，比东部平均低 56.54 个百分点。

4. 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

1980 年与 1995 年比较，西部地区 9 省、区职工平均工资在全国的位次除云南外，8 省、区下降是相当显著的。其中，四川由 19 位下降为 22 位；贵州由 16 位下降为 24 位；西藏由 2 位下降为 4 位；陕西由 13 位下降为 26 位；甘肃由 4 位下降为 10 位；青海由 1 位下降为 9 位；宁夏由 6 位下降为 17 位；新疆由 3 位下降为 12 位。同期，东部各省、区、市除辽宁外上升则相当明显。北京由 7 位上升为 3 位；天津由 10 位上升为 6 位；上海由 5 位上升为 1 位；河北由 21 位上升为 18 位；山东由 18 位上升为 15 位；江苏由 30 位上升为 7 位；浙江由 27 位上升为 5 位；福建由 26 位上升为 8 位；广东由 12 位上升为 2 位；广西由 24 位上升为 16 位；海南由 28 位上升为 13 位。

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西部地区的青海、西藏、新疆分列全国各省、区、市的1、2、3位；1995年前三名则为东部地区的上海、广东、北京。

5.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

1980年与1995年比较，西部地区9省、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位次全部为下降趋势，四川由15位下降为23位；贵州由23位下降为25位；云南由27位下降为28位；西藏（1985年数）由20位下降为22位；陕西由28位下降为29位；甘肃由26位下降为30位；青海由12位下降为27位；宁夏由19位下降为26位，新疆由13位下降为24位。

同期，东部各省、区、市基本是保持和上升的趋势，北京第二位次不变；上海第一位不变；河北由18位上升为11位；山东保持11位不变；江苏由9位上升为6位；浙江由8位上升为3位；福建由21位上升为7位；广东由5位上升为4位；广西由20位上升为16位。

1980年，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低为陕西省142元，为全国最高上海402元的35.3%。1995年，西部地区同指标最低为甘肃880元，为全国最高上海市4246元的20.7%。可见，差距拉大是相当惊人的。

6. 社会发展动量指标的差距

社会发展速度和社会水平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反映地区间的差异，为了使社会发展速度和水平兼顾起来进行综合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朱庆芳计算了“社会发展动量指数”，用发展速度乘以社会发展综合水平的得分，综合反映各地区社会发展的能量和实力。它既反映了存量，又反映了增量，是相对稳定的量。根据1995年各地区社会发展水平与17年的发展速度相乘进

行估算，社会发展动量指数全国平均为 140.8%，居前 10 位的省、市、区为：广东 233.2%、上海 223.7%、浙江 221.2%、江苏 216.4%、北京 192.0%、山东 192.4%、天津 191.8%、福建 174.8%、海南 168.9%、河北 152.4%。居最后 5 位的是陕西、西藏、甘肃、贵州、青海。可见，从社会发展动量指标看，东西部差距也是相当突出的。

（三）东西差距的个案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东西差距拉大的问题，下面进一步用西部地区的贵州省作为典型例子，与东部地区福建省作比较。之所以选择这两个省比较，是由于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两个省的经济水平虽有差距，但悬殊并不是很大。而到 1995 年，差距则相当惊人了，见下列数据：

国内生产总值

1980 年贵州与福建分别为 60.26 亿元、87.06 亿元，两者之比为 1:1.44；1995 年分别为 630.07 亿元和 2160.52 亿元，两者之比变化为 1:3.43。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980 年贵州与福建分别为 219 元和 350 元，两者之比为 1:1.60；1995 年分别为 1853 元和 6965 元，两者之比变化为 1:3.76。

固定资产投资

1980 年，贵州与福建分别为 33.13 亿元和 55.15 亿元，两者之比为 1:1.66；1995 年分别为 173.66 亿元和 681.17 亿元，两者之比变化为 1:3.92。

地方财政收入

1980年，贵州与福建分别为6.69亿元和15.33亿元，两者之比为1:2.29；1995年分别为38.80亿元和184.58亿元，两者之比为1:4.76。从位次变化看，贵州财政收入1980年居全国各省、区、市第24位，1995年仍为24位，而福建则从1980年的第18位一跃而变为1995年的第4位。

职工平均工资

1980年，贵州与福建分别为755元和703元，两者之比为1:0.93，贵州高于福建7个百分点，到1995年分别为4475元和5857元，两者之比为1:1.31，贵州比福建低了38个百分点。从位次变化看，贵州职工平均工资1980年居全国各省、市、区的16位，1995年下降为24位，而福建则由1980年26位一跃变为1995年的第8位。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1980年，贵州与福建分别为161.50元和171.75元，两者之比为1:1.06，到1995年分别为1086.62元和2048.59元，两者之比为1:1.89。从位次变化看，贵州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由居全国各省、市、区的第23位下降为1995年的25位，而福建则由1980年第21位上升为第7位。

工业总产值

1980年，贵州与福建分别为45.19亿元和81.18亿元，两者之比为1:1.80，到1995年分别为593.97亿元和2286.48亿元，两者之比变化为1:3.85。从位次变化看，贵州工业总产值1980年居全国各省、市、区的24位，1995年下降为26位，而同期福建则由19位上升为13位。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980年，贵州与福建分别为26.73亿元和54.20亿元，两者之比为1:2.03，到1995年分别为197.60亿元和670.37亿元，两者之比为1:3.39。从位次变化看，贵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80年居全国各省、市、区的26位，1995年仍为26位，而福建则由1980年的第18位上升为第14位。

实际利用外资：

1985年，贵州与福建分别为1287万美元和17711万美元，两者之比为1:13.76，到1995年分别为9637万美元和413996万美元，两者之比为1:42.96。两地之差由13倍左右上升为近42倍。

以上两省的这些有关指数说明，贵州和福建在1980年差距存在但多数指标差距不超过一倍，到1995年多数指标差距均在2倍以上。

（四）东西差距特征分析

为了深入认识东西差距问题，有必要将其特征作进一步归纳：

1. 严重性。这是东西差距的特征之一，以上我们已用面上的数据论证了这一问题的存在。实际上，倘若用特例，则更能进一步证明此问题。1993年，我国最富的地区珠海市区（不包括斗门县）与最穷的地区贵州省晴隆县人均GNP之比为86倍，两者之间的人均GNP之差高达28069元。贫困问题，是东西差距的最显著标志，近些年来，从主体上讲，扶贫攻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另一方面，脱贫后又“返贫”的现象也相当严重。在云南的昭通地区、贵州的麻山地区、陕西的安康地区、青海的玉树州、宁夏的南部山区、甘肃的庆阳地区、新

疆的南疆地区，每年的返贫率分别在 15% ~ 40% 之间，至今还存在着衣不蔽体、屋不避风、食不果腹的特困人口，有的群众居住条件十分恶劣，整个家产仅值 50 元左右。

2. 综合性。这是东西差距的特征之二。东西差距的拉大是多方面的，既有改革方面的差距，又有发展方面的差距，既有经济方面的差距，又有社会、文化方面的差距。在改革方面，西部地区在所有制结构上，至今仍有 70% ~ 80% 是依托在国有经济的基础上，而东部地区恰恰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 20 年中，发展出一大块具有相当活力和实力的非国有经济，使其成为地区经济大发展和国民收入高增长的源泉和依托。在社会发展方面，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指标”课题组的研究，从经济效益指数、社会结构指数、人口素质指数、生活质量指数等各个指标考察，增长得最快的基本上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效益指数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社会劳动生产率、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人均地方财政收入、每一农业劳动者生产粮食 6 个指标组成，它综合反映了全社会及工农业生产效益的增长情况。1978 年—1995 年，全国经济效益指数平均每年增长 6.0%，海南、广东、浙江三省增长最快，分别为 10.7%、10.3% 和 9.8%，增长最慢的为西部的甘肃省仅为 4%。社会结构指数由第三产业劳动者比例、非农业劳动者比例、非农业人口比例、社会投资比例 4 个指标组成，“八五”期间此项指标增长得最慢的为西部地区的西藏、宁夏。人口素质指标由人口自然增长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每万人口大学生数、每万职工专业技术人员数、每万人口医生数 5 个指

标组成，反映了人口的文化、技术、健康素质的高低。此项指标全国 1978 年—1995 年间平均每年增长 4.1%，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的山东、浙江、上海速度最快，平均每年分别增长 5.8%、5.7% 和 5.6%，而西部地区西藏的速度最慢，平均每年递增 2.8%，青海也仅为 3.4%。“八五”期间，此项指标上海、山东增长最快，分别为 13.3% 和 10.6%，而西部地区新疆为 4.1%、甘肃为 2.3%、云南为 2.3%、四川为 2.8%、陕西为 4.4%、贵州为 2.7%、西藏为 4.3%、宁夏为 3.1%、青海为 1.3%，比东部沿海地区普遍低。生活质量指数由居民消费水平、人均零售额、农民人均纯收入、职工平均工资、每一职工劳保费 5 项指标构成（均扣除了价格上涨因素），反映居民实际的消费、收入和社会福利水平。全国 1995 年比 1978 年增长 224.0%，平均每年增长 7.2%，其中以沿海地区的江苏、浙江、上海、广东为最快，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在 9.3% ~ 8.0% 之间，而西部地区各省、区此项指标也普遍偏低，新疆为 5.8%、四川为 5.8%、西藏为 4.8%、贵州为 5.0%、宁夏为 4.9%、甘肃为 5.1%、陕西为 4.4%、青海为 3.8%，仅云南显得略高为 6.0%。

3. 加速性。从近年发展的趋势看，东西差距拉大还具有相当程度的加速性。统计资料表明，近几年东部地区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各省年均增长速度在 20% 以上，而西部各省、区都在 10% 以下，照此趋势，东西差距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未来的若干年内，还有继续拉大的加速性。

根据各地区已定的“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西部地区各省、区不仅与东部相比差距将继续拉

大，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也具有继续拉大的惯性，以云、贵两省的发展规划为例。见表 1：

表 1 云、贵发展规划主要指标比较表

指 标 名 称	2000 年			2010 年		
	全国	贵州	云南	全国	贵州	云南
年末总人口(万人)	130000	3770	4300	140000	4290	4893
人口占全国(%)		2.9	3.31		3.06	3.50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85000	970	1933	166486	2516	4172
GDP 占 全 国 (%)		1.14	2.27		1.51	2.51
人 均 GDP (元)	6538	2573	4495	11428	5865	8526
人均 GDP 比全国少(元)		3965	2043		5563	2902

从表 1 可以看出，按照目前拟定的 15 年远景目标，于 2010 年，云、贵两省比全国平均水平拉得更大了。如人均 GDP2000 年贵州比全国少 3965 元，到 2010 年扩大为 5563 元，2000 年云南比全国少 2043 元，到 2010 年扩大为 2902 元。

4. 持久性。要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这就要求西部地区以高于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持续增长，这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东西差距拉大的趋势仍继续存在。

第二部分 深层的思索： 东西差距的成因分析

东西差距的拉大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下面就主要因素进行分析。

（一）历史因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东西差距的形成具有其久远因素。19世纪40年代初，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船坚炮利”打开中国东南沿海的门户，在广州、上海和长江流域开辟了许多通商口岸，在输入大批洋货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中，创办的主要企业均集中在沿海一带。如1861年创办的安庆机械厂、1865年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1866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局、1867年创办的天津机器局、1872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1890年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等。1880年开平煤矿建成中国第一条实际使用的铁路——现京沈铁路唐山至胥各庄段。由这些情况可知，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目的是企图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进而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富，并不想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但客观上却使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最早接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东部沿海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这使

东部沿海地区在商品经济意识、市场意识、开放意识等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熏陶；在办企业和经商方面有较之内地更为深厚的经验积累；在与外商华侨等海外联系方面较之内地有更为广泛的联系网络，因而，改革开放的大潮，使这些本来就拥有的优势具有了现实的、广阔的用武之地，其发展速度的大大加快就不难理解了。

而从西部地区来看，历史上基本处于封闭落后状态，古时被称为“蛮”、“夷”。远离政治文化中心，许多文化交流、政治信息的传入仅靠充军、发配和战乱等事件进行。即使到了建国初期，我国 70% 以上的工业仍然集中在面积不到全国 12% 的东部沿海地区。广大的内地，除沿江的武汉、重庆等少数几个工业城市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工业。占国土面积 68% 的西南、西北和内蒙古的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 9%。整个西部地区，铁路是空白，公路也极少，不少地区的自然经济与外界隔绝。如当时的西藏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社会，四川的凉山地区还是后期的奴隶社会。这些情况表明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

（二）地理因素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看，沿海地带，特别是港口发达地带具有发展外向型、开放型经济得天独厚的条件，往往是经济最先发达的区域。世界经济布局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今，环太平洋和环大西洋经济圈经济最为发达，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辐射带。而我国西部地区深居欧亚大陆腹地，大约西距大西洋 6000 ~ 10000 公里，东至太平洋 500 ~ 4000